
* 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 *
* (草稿) *

周 中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1960年8月7日

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況（草稿）

1960年8月7日

前 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中国共产党东北組織，最初短时期基本上奉行全国一致的革命路綫，1933年1月以后，依照中央新的指示，在东北貫徹执行“抗日統一战线”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过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前后十四年。东北党组织和东北人民写下了东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光荣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按照毛澤东同志的思想指导来加以系统地总结。有待于各方面的及早努力。本文仅仅用單純的回忆形式，并偏重于軍事方面作概括的敘述，提供作了解，研究东北人民革命历史的参考的素材。

一、东北一般状况

旧中国人民說：“关东山有三宝：人参、貂皮、烏拉草”。不如說：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長的好，世界著名的原始森林参天高；地帶虽然处于严寒，正因冰雪复盖着广阔的原野，滋润了肥沃的土壤，風調雨順，水利丰富，实为农、林、牧、副、漁的好乡土。能供应现代化的地下蘊藏，种类几乎应有尽有，数目非常之多，真是一块半开发或未开发的处女地。就这样，“西夫無罪，怀璧为罪”招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貪婪，日本軍閥首相田中义一奏摺上說的“滿洲非中国領土”，成为日寇大陆政策，侵略中国，称霸世界，首先必須夺取的扩张基地。

1928年蒋介石反动派与奉系軍閥張学良“易帜”合流以后，东北地区包括原热河省，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統治在东北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危机的爆發，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經濟相对穩定，促使美、英、法極力拉攏蒋介石南京政府，也拉攏奉系張学良軍閥，这样，就加剧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一方，美、英、法帝国主义为另一方之間，为爭夺中国，爭奪东北的尖銳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以旅大及附属地为根据，有近三十年的经营，在南满握有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控制权，当然不能容忍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同时社会主义苏联工业化以及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推进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国家越来越巩固，以美、英、法为背景的蔣、張鼓动的反苏进攻又遭到挫败，中国土地革命在长江流域正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影响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中国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与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差不多都错综复杂的集中到东北，或直接间接影响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为着准备进攻苏联，特别是它认为要进行大举进攻侵略中国，同时为扑灭中国方兴未艾的革命尽其炮灰作用，反对它的竞争者美、英、法帝国主义，那就不顾发动武装侵略佔领我东北不可。日本帝国主义也估计到，一旦战争爆发，南京蒋介石政府是会选择顺受，宁肯对外不抵抗，不肯放松对内反人民反革命。而以美帝国主义为后台，英、法操纵“国际联盟”是袖手旁观，放任日寇为所欲为的。于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走钢丝”当作坦途，向东北平行武装进攻。

三 事变的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9月18日夜，炸毁了沈阳北郊条河火车站，制造“沈阳事件”为借口，突然开炮轰击奉天北大营和兵工厂，佔领沈阳市，接之而来的就是南京政府蒋介石总司令北平张学良副司令下令“不抵抗”，“退让”“投降”，助长了日寇进佔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翌年一月进佔哈尔滨，大体上控制了满洲战略地区。三月一日建立伪满洲国，抬出傀儡溥仪做“执政”。从此东北淪陷，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做牛马奴隶的奇灾大难。当时民间曾传诵着这首歌谣：

日寇袭来莫慌忙，攘内安外蔣主張。
御敌有术不抵抗，夜贈領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殺乱命，叫尔小民做羔羊，
亡国恨！空前絕后，要生存惟有自强。

三 党的主張

在中国大革命以及土地革命时期，东北虽然没有像长江流域那样，掀起过大的风潮，但东北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識分子，他們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影响下与东北党組織的实际行动领导下，曾經在南满和北满一些地方發生过规模較小的反帝反封建、反买办階級的革命运动。1928年蔣介石国民党反革命与李系軍閥張學良合流以后，这一斗争日趋尖銳，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国軍閥执行帝国主义使命，向苏联进行試探进攻。共产党特別指出：东北的外来危險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心陰謀。东北人民和土地有被反动統治者出卖的可能性。不幸而言中“沈陽事变”証明了这个預言。同时也表明了东北人民对日寇侵略东北，不是沒有思想准备的，不是沒有革命行动經驗的。

事变后兩天，中国共产党中央發表宣言，九月二十一日滿洲省委發出紧急通告，通告指出日寇侵略东北其目的是要侵略整个中国，并为进攻苏联作准备。中国人民、东北人民的民族灾难是南京反动統治者蔣介石国民党不抵抗，卖国投降政策带来的。不能寄予它任何幻想，号召人民群众和武装軍队、自己起来救国自救，組織民众政府，自动抵抗日寇进攻，才是唯一的出路。党这一号召深入东北民心，因而掀起了东北初期抗日救国高潮，武装軍队紛紛起来抵抗日寇，給日寇以最初的打击，迫使日寇不能不推迟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計划。

四 初期抗日，旧軍队的崩溃

事变爆發后，东北广大軍民，对南京政府的“孤軍”“不抵抗”感到非常失望，因而掀起了义憤，在日寇还未佔領的北满，吉东地区，掀起了自动抵抗浪潮，黑龙江地区馬占山所部，于1931年10月揭起抗日旗幟，部队开往嫩江桥前綫，英勇地阻击进攻的寇軍；繼而起有：东北屯垦部队，苏炳文（黑龙江省抗日軍），中东路护路軍丁超軍两个旅，鎮守依蘭的李杜二十二旅；宁安張振邦的二十一旅；守备吉木市的馮占海、李海青等的警衛队（吉林自衛

軍) 辽宁旧东边道的地区的奉軍唐聚五、李春潤部队(辽宁民众自衛軍) 等都宣布“抗日救國”。駐在延边的原吉林陸軍第三旅的第七团的“老三營”，以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为首在事变后不几天暴动起来了，吃哪閒卷入数万之众，組織救國軍到处打击日寇。辽南三角地带有邓铁梅、王鳳閣、苗克秀等东北救國义勇軍，在辽西和辽热边境有耿繼周等的反日义勇軍，以外各地保安队，警察武装也紛紛起来抗日，有些地区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組織大刀会、紅槍会起来积极抗日。就是那些由畸形社会条件造成的“南队”队伍也都打起“反日山林队”旗号，阻抗日寇的行动。从事变后到1932年初，北滿、吉东、东滿地区的抗日武装达三十万人，辽东南和辽西近十万人。其中五分之三是旧东北的正规軍，人員、軍队装备很完整的。有相当的战斗素养。軍事后各潜力是很大的，仅民間槍械近百万。作战依据和週旋地区是很广的。这四十万左右的軍队受到全东北人民沸騰的抗日情緒所鼓舞，他們的斗志是高昂的，中国共产党滿洲組織当时的力量虽然还微弱，政策指导和工作活动还有局限性。但是党的組織和党员，共青团員，曾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在各地給这些抗日武装軍队以各种支援。1931年10月中共滿洲省委和北滿特委曾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識分子以“抗日援馬代表团”名义，到黑龙江战地进行慰問和宣傳鼓动，派志願兵参加战斗。翌年一月曾在哈尔滨宣傳和組織各阶层群众支援吉林自衛軍在双城、榆樹地区的作战，协助保衛哈尔滨的活动。当救國軍在延吉暴动前夜，中共东满特委派遣有力干部多人，参予暴动和組織救國軍的計劃。在救國軍进攻敦化、額穆、东京城、宁安、汪清地区行动中，党的干部同該軍的上層领导左傾激进分子联络一气，树立了坚强作战指揮，并动员东滿革命群众組織义勇軍参加作战，或担任交通運輸，以及敌后的別动游击。中共南滿特委和吉奉铁路沿线的党组织以同样的积极行动，对辽宁民众自衛軍，辽东、辽西反日义勇軍給与支援。各级党的活动干部，曾向这些旧軍队的上層领导恳切的提出过必須依靠群众，拥护群众利益；抗日軍队必須團結一致，建立分区活动，統一指揮，互相策应，互相支援。并須采取机动作战，放棄單純防御。党曾經耐心的开导和不倦的宣傳解釋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首先是鼓舞朝鮮民族的抗日积极

性，使他們广泛地參加抗日斗争，但是这些旧军队的上层领导們，十有八九保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影响，或原封不动的佔据着消极，不抵抗或投降的立場。他們拒絕党的主張，有的人口头上接受，暗地里破坏；或者接受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拒絕認為于己不利的部分。在某些領導上层人物中，虽然没有执行公开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們認為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自动組織武装抗日是非法的，因此最初时期，党所領導的巴彦游击队、海倫游击队、湯原游击队被黑龙江抗日軍摧毀了，穆稜和密山游击队被吉林自衛軍繳械了，盤石和海龍游击队兩次受到辽宁民众自衛軍和地主武装圍攻。延边各县的游击队受到救國軍的限制；救國軍領袖之一孔宪荣不止一次的陰謀暗杀党在该軍中的領導干部和左翼激进分子。

这些旧军队上层领导們，虽然搖擺着抗日救國的旗帜，軍隊下級军官和战士和人民群众还跟着他們走，但是他們并未脫离旧軍閥的老路，他們以国民党的思想影响欺騙人民群众，蒙蔽爱国战士；他們之間經常为了搶夺地盘扩充个人势力，調取关内外爱国捐款，分配駐地軍事物质进行内部斗争，互相火併，在軍事上与寇軍接触，士兵在前线奋战將領就在后方逃亡。各軍之間沒有相互支援，相互策应。甚至有些將領“身在曹营心在汉”早与日寇特务勾搭，或者促成抗战行动舞台，或者一遇局势稍为动摇就投降日寇。

当着黑龙江抗日軍正在嫩江桥声势浩大的胜利的阻击日寇的时候，拉爾屯县區苏炳文等以及吉林省丁超、李杜等的自衛軍靜靜地作“壁上觀”。等到日寇移轉打击，丁、李、苏等不得不起來抵抗寇軍的时候，而声震一时的“民族英雄”馬占山变为狗熊向日寇屈膝投降。日寇正准备从牡丹江西岸向吉林自衛軍和救國軍进攻的前夜，救國軍孔宪荣，謀杀了左路总指揮孔宪章，給日寇造成进攻有利条件。

总之，初期抗战的最大弱点是：第一，国民党反动統治不抵抗，投降政策的思想影响还在这些抗日旧軍領導上层人物中佔着統治地位。第二，广大群众和爱国战士还没有能够从反动統治傳統思想下解放出來了，因此束縛了高昂的斗志。第三，共产党在东北組織的革命武装力量——人民游击队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在这些旧军队里起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关东軍最初仅仅以三个师团的兵力發動事

变，并迅速佔領沈陽、長春、吉林、齊齊哈爾以後寇軍增加到四個師團向北滿和吉東、東滿舉行進攻。日寇充分地利用了抗日的舊軍隊上層領導的腐敗和弱點，施展政治分化，特務滲透，進行挑撥离間和收買誘降，配合着正面的軍事行動，這些龐大數量的抗日軍隊，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被各個击破。并使之趨于崩潰和瓦解。日寇輕而易舉地控制了滿洲的整個局勢。雖然在嫩江地區，吉林、長春地區，奉天鐵路沿綫，牡丹江流域及其以東地區，曾對日寇軍進行過無數次的激烈抵抗，犧牲了不少的英雄人物。而日寇死傷亦達二萬餘人，但是由於馬占山、丁超等投降，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的逃跑，使這場轟轟烈烈的抗日鬥爭宣告挫敗，影響所及使東北廣大人民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的浪潮趨于低落。

五 抗日游擊戰爭新高潮

在舊軍隊为主体的抗日鬥爭過程中，雖然中共東北黨組織的各種活動受到反动派上層領導的反对、阻撓、破壞，但是黨堅持不渝地執行了中央的指示路綫，組織人民群眾，組織人民武裝，以堅決徹底進行抗日自救，收復失地為使命。在1931年——1932年間在南滿，東滿，北滿各地區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青年、愛國人士中不斷的宣傳鼓動，組織群眾性的，公開的、秘密的“反日會”，農民义勇軍（有原始武器或無武器）。延邊、磐石、海龍、寧安、穆稜、密山、饒河、湯原等縣組織了人民游擊隊（赤色游擊隊）。這些游擊隊雖然受到國民黨反动派的反对、限制，几經破壞，但仍然主動地勇敢地參加舊軍隊的抗日作戰。在鬥爭中不斷獲得巩固和發展。

1935年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到達滿洲省委，正是舊軍隊崩潰瓦解之後，人民群眾悲觀失望，日寇親手稱慶進犯熱河，巩固長城綫，向南滿政府施加壓力，締結“塘沽協定”的時候。滿洲省委号召与督促全東北黨，貫徹執行統一戰綫政策。一方面加強擴大各地人民游擊隊，另一方面在潰散後的各色反日武裝部隊中開展積極工作活動，以挽回東北抗日消沉和混亂的局勢。首先在吉東地區处于半崩潰狀態還有三萬左右武裝救國軍中，加強黨的領導，

重新建立救國軍總司令部，編整各路軍隊。1933年4月10日，在救國軍總部直接指揮下，第二次攻占安圖縣城、控制了全縣和鄰近的撫松、樺甸、敦化、蛟河各縣的一些小城鎮和地區，建立起“遼吉邊區”根據地，不斷進出襲擊“京圖鐵路”沿綫的交通運輸和寇軍據點。在寧安縣境、新編的救國軍——游擊軍司令部的領導成員都是共產黨員幹部，組織了黨委。他們團結了救國軍，自衛軍殘部和反日山林隊約二萬人左右，在救國軍游擊軍司令部直接指揮下，攻佔了東京城、南湖頭、襲擊了寧安縣城，展開了牡丹江流域大小戰鬥，不斷打擊出擾的日寇，威懾中東鐵路東綫地區。東滿延邊各縣的人民游擊隊，打破了日寇民族挑撥政策。過去的民族歧視、對立，一變而為民族團結合作。他們與救國軍和各種反日山林隊相互支持，西區“遼吉邊區”，東達中東鐵路，朝鮮人民游擊隊一一團結好、紀律好、戰鬥力強一成為一支抗日游擊隊核心力量。南滿方面自1933年夏，海龍和磐石游擊隊合併改編為磐石人民游擊隊，同年秋擴編人民革命軍第一獨立師。在這過程中，由於該部隊的積極活動，聯合與支持着吉奉鐵路沿綫最大的反日山林隊“雙臣”“雙江”（羅明星），“老雙勝”“德林”等約萬人的抗日武裝，不斷破壞鐵道交通、伏擊日寇，奉吉鐵路交通曾被遮斷半年之久。吉林省和撫順礦區經常受到威脅。磐石人民革命軍分遣部隊擴張活動到達通化及安奉鐵路綫，聯合着那地區的王鳳閣部隊以及遼寧自衛軍的殘余、鄧鐵梅、苗克秀等部的七八千人堅持抗日游擊鬥爭。

由滿洲省委直接指導的珠河縣中心縣委，1935年成立了“珠河游擊隊”在哈爾濱以東松花江右岸，中東路南側、展開游擊鬥爭，不斷獲得勝利，吸引着自衛軍的殘余部隊李華堂、于海云，考鳳林及其它反日山林隊，共約一萬多人的武裝，以珠河游擊隊——哈東支隊為中堅，繼續同日寇對抗，遠在綽河中心縣委領導的綽河游擊隊，支持着救國自衛軍陳東山、高玉山等四、五千人的抗日部隊聯合行動，曾經攻佔虎林縣城及團山子等地。不斷打擊烏蘇里江左岸的寇軍。

這一個時期的特點是（一）南北滿由舊軍隊留下來的，以新的組織形式出現的抗日武裝總計十餘萬人左右，國民黨反动派的思想影響不再起領導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共產黨，它的威望提高了，統一

战略政策思想和开展人民游击战争的行动的主张，大体上为他们所接受。(二)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游击队逐渐扩大加强了，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比较系统的、高级的组织形式并成为各种抗联武装的榜样和核心力量。(三)南北满各地抗日武装广泛的开展，规模不同，作战方法不同的游击战斗，比起抗日初期，日寇军所到之处遭到打击和兵力损伤的情况越来越多，迫使日寇改变以往的作战方式——以静制动、以少胜多、分进合击，各个击破；日寇不能不增加兵力，分散到广大地区，处处防守，陷于被动，随时随地有遭受袭击的危险。(四)1933年下半年以后，不仅在游击地区的人民群众几乎普遍的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直接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就在寇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沿线据点，也都建立起地下“抗日救国会”和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过初期短时间挫折之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日寇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人民游击战争，为了更大的压榨和欺压东北人民，为了淆乱国际视听，表示侵华反苏的决心。1934年初，改组“满洲国执政”为“满洲帝国”。开始实行保甲制、连坐法、身分证、强迫群众组织“协和会”施行奴化教育，大批的掠夺民族工商业，收缴地照和民间枪械，并实行武装移民，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向人民加紧压迫；同时不断的增加日寇关东军，改组伪军。(1934年初日寇达二十余万人；1935年增加到三十万人，1937年达五十万人)。在军事行动上，以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要对象，在不断的进行大“讨伐”。日寇计划在较短的时期内达到“治正肃正”巩固“满洲国新秩序”，但是情况的发展与日寇想像相反。由于民族的压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政策，人民觉悟的提高；新型抗日军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东北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经过初期短暂时期挫折之后，又重新一直高涨起来了。

1934年初在依兰县土龙山区为反对日寇缴地照和枪械激起了震动中外的数万农民大暴动、在不到十天之内，在一个县区就打

死打伤日寇飯塚大佐以下三千余人，暴动很快的蔓延到松江右岸的富锦、同江，宝清、勃利各县。在这同一时期正是南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部队佔据着广大农村地区，向日寇佔领的中心城市、铁路沿线据点，开展不断的袭击，粉碎了敌人的出击和历次的“大讨伐”，形成1933年夏到1937年間的抗日游击运动高潮。这一长时期內，东北党基本掌握了并貫徹执行中央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1935年中央“八一宣言”，1937年4月15日“告全党同志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 抗日联军的建立

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1929年到1930年中共东北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时期，在延边和綏宁以及吉海铁路各地区，曾在农村中、工人中組織过地下武装——赤色游击队和人民自衛队，它主要目标首先是反对同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結的东北地主军阀，这些队伍虽然人数不多，并且使用原始武装活动不经常，存在的时期也不长。但是对于群众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演”。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东满延边各县的反日游击队，吉海铁路——磐石、海龙县反日游击队、密山、饒河、湯原反日游击队，很迅速的建立起来，虽然受旧军队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破坏、阻挠，但这些游击队有历史根原，直接从革命群众中产生，因此颠扑不破。在抗日内部斗争中，在同日寇战争中，逐渐成长壮大。不像“巴彥游击队”那样，缺乏斗争历史經驗。加上該部队领导干部又执行錯誤路線脱离群众。結果使时机成熟人数众多，槍馬齐全，地帶条件优良的部队，經不起風險，很快的瓦解無遺了。

1934年末，中共滿洲省委根据抗日新高潮及人民武装斗争的新發展，把东北人民革命軍，反日联合軍，抗日同盟軍等队伍，逐步着手进行統一的军队建制，人民武装游击运动越来越加强了。到了1935年6月，狂醉于侵略的日寇，借口南京蔣介石卖国政府履行“塘沽协定”不力，以軍事重压加于平津和整个华北，引起全国憤慨，中共中央深感民族危机严重，發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主張全民抗日，組織“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东北人民武装就

在这前后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如下：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1931年末在伊通、磐石、海龙建立了反日的赤色游击队，1932年春，磐石、哈马河子中朝农民暴动以后，地下人民武装——自卫队，和义勇军这些队伍合并为磐石——赤色游击队（红军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九一八”二周年在磐石建立东北人民革命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有两个团和师直属队。1934年纪念俄国社会主义十七周年，扩建为二个师和军直属警备团、少年营，并在通化地区、鸭绿江左岸，安奉铁路两侧，以统一战线形式，组建了十个游击支队，以联系辽宁民众自卫军和东北反日义勇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等。1935年秋，改编为三个师。正式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一军。

抗日联军第一军最初的根据地在磐石的二、三区，蛟河河子、石虎溝、桦甸县漂河、横道河子，色洛河、红石砬子，辉南县和金川县、大房身、二岔溝以及撫松县、通化、临江、辑安、长白各县的山区。基本的游击区是扩大到吉奉铁路，安奉铁路和通化地区，鸭绿江右岸地区二十余县。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延吉、汪清、和龙、辉春等县，“九一八事变”前，以及以后不久，曾实行着土地革命路线，在一些山区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和赤色游击队；救国军王德林暴动起来以后，中共东满特委除派遣干部参加该军暴动，并指示各县游击队和积极加强反日游击斗争。并从汪清县里的赤色游击队里抽调五十八左右的一支小部队参加救国军为“别动队”。

1932年各县“赤色游击队”及“别动队”都有相当的发展。1933年初，东满特委，正式取消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改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会”和“人民代表会议”。把各县的“赤色游击队”，反日游击大队，于1934年春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延吉大队编为第一团——六个连，和龙大队编为第二团——七个连。1934年末——1935年初以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为骨干，改造成功了救国军中一个旅，扩编为两个师，一个警备营，一个青年义勇军大队。正式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二军。1935年末，扩编为四个师，军直属警备团，青年

义勇大队，（义勇队）。

抗联第二军最初的根据地是：延吉县的磨盘沟、倒本沟、海兰江山区和哈尔滨山区，汪清县的大小汪清、綏芬河山区，八里沟、对头沟子、候营沟、大黄崴子以及汪清和珲春之间的山区。后期的根据地是安圖县、敦化县、輝南县交界及撫順、長白山山区。基本游击区是中东铁路东线以南，“圖佳铁路”，牡丹江市以南，“京圖铁路”老爷嶺以东到圖門江。西部为撫松、蒙江、長白、臨江、輯安等約二十县。

抗日联军第三军，1933年初滿洲省委，鑑于巴彥游击队和珠河工农反日义勇军与孙朝陽救国义勇军失败的教訓，指示珠河中心县委坚决执行組織人民武装：“反日游击队”，这个队初期正响执行了这一指示，把从孙朝陽部队分立出来的李啓东等同志的武装和珠河地方武装合并組織起来。大力开展珠河、阿城、双城等地区游击战斗，队伍迅速扩大。1933年10月10日在珠河县宣告正式建立“珠河反日游击大队”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队，一个少年先锋队，1934年6月因战斗不断胜利队伍发展壮大，扩建为“哈东反日游击支队”。下分九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一个迫击炮队、一个教导队。同时以哈东游击支队为基础，联合其它各色队伍，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东北反日联合军”。1935年1月28日建立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同年8月1日，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三军，初編九师之众，后縮編为六个师。

抗联第三军的根据地，最初在珠河、延寿、五常以及方正县大小罗敦密一带，1936年以后主要根据地移轉松江左岸湯原、东兴、庆城以及北安，綏化以东山区。該军基本游击区最初以哈尔滨以东松江右岸十余县，以后扩大移轉于松江右，“綏化、佳木斯铁路沿路及黑龙江右岸之蘿北、佛山、綏濱县等共达三十余县。

抗日联军第四军，在“九一八事变”王德林暴动組織救国军以后，許多次的重大战役如攻佔敦化、額穆，伏击天野部队，进攻宁安以及中东路磨刀石車站阻击寇军等等。救国军总部直屬的补充团起着骨干作用。这个团始终是在党的政策思想指导之下行动。王德

林、孔宪荣逃亡后这个团成为救国军新编的“游击军”的骨干，在綏宁地区联合清救国军和自衛軍殘部以及反日山林队，掀起新的抗日战斗，形成那一地区的抗日新高潮。但是由于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党的組織領導意志不集中，沒有堅決執行吉东党的軍事指示，从宁西南部輕易的向中东路以北移动，結果遭到寇軍多次狙击，部队受到一些損失。1933年多，游击军司令部和补充团到达密山和林口以东地区开始新的发展，1934年秋中共密山县委领导的密山游击队合併編入游击军增加新的核心力量，建立抗日同盟軍第四軍并开展了密山、林口、勃利、依蘭、方正以及东部宝清、虎林、綏河一带的游击活动，1935年多正式改建为东北抗日联軍第四軍，初編为兩师，1937年初扩編为三个师。

抗联第四軍最初根据地地方正县与依蘭县的山林地区大小罗勃密一带，1937年以后移轉富錦、宝清、綏化交界地区。游击区为牡丹江——佳木斯铁路兩側及北老爷嶺东西地区，宝清、富錦、密山一带十余县。

抗日联軍第五軍，这个軍是在救国軍辽吉边区部队、綏宁地区部队以及吉东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1932年—1933年中共滿洲省委軍代表，宁安县委，吉东局、吉东特委、东滿特委以統战方式从各方面在整个救国軍中积极活动，在該軍前方司令部和一些部队里建立起党的組織。经过宣傳部在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傳教育，并动员革命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該軍有的当战士有的做各級工作。当时的方針是：一方面直接促使救国軍“左傾”革命化，堅持抗日，另一方面造成有利条件，如东滿延边各县游击队以及吉东地区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裝”易于成長壯大。在三年多的过程中这一方針基本是实现了，但也有失敗的經驗教訓，例如1933年秋李光“别动队”受襲击。1934年夏末“工农义务队”的被奸細拉走，救国軍总司令部上層統一战线不能不做裂。但是从全局看党的方針是正确的，工作是成功的，抗联第二軍第二师和第四軍的建立都是有救国軍的工作淵源。第五軍的

多数部队还是由救国军部队彻底改造过来的。

1933年冬，党估计到救国军内部分化，上层统一战线存在危机，在宁安东部（平日坡）以辽宁边区部队“工农义务队”，宁安游击队为基础与救国军总司令部相平行的建立起“吉东抗日同盟军”设军事委员会。党的同志完全掌握了领导。1933年—1935年间，同盟军委会联合了宁安、敦化、额穆、舒兰、章河、牡丹江等地的救国军和自卫军残部以及大量的“反日山林队”展开了不断的游击战斗，来锻炼人民革命武装。1934年秋为接受失败的教训，把辽吉边区部队和“工农义务队”失败后所有的干部，都加强到宁安游击队并把它扩编为“吉东游击大队”。1935年2月在宁安三道河子区域宣布建立抗日联军五军，初编两个师，第一师三个团，第二师三个团，不久增编第六团，军直属一个警卫营、一个教导队。抗联五军南面与抗联二军联络，北面与抗联其它军队呼应，在不断胜利地打击寇军中充实壮大。1937年7月5日伪满驻牡丹江森林警察大队七百余人行军参加抗联五军，接清在林口地区也有伪军起义来投。于是扩编为第三师，军属教导团、警卫营。

该军最初的基本根据地，在宁安—额穆、镜泊湖沿岸以及牡丹江西岸老爷岭和东岸老松岭山区。1935年夏移驻北部牡丹江西岸和刁翎地区。1936年到39年延伸到勃利县，东部富锦、宝清，南部完达山脉两侧山区。基本游击区西南起敦化额穆，沿牡丹江两岸北达依兰，再从方正松花江右岸直达肇川、富锦、宝清中间有“图佳铁路”“中东铁路”“林虎铁路”“穆稷铁路”。

1938年曾伸张到哈尔滨东南中东路两侧和拉图铁路以东，共20余县地区，五军一师1936年曾跨过松江，一度进出东兴、庆城、铁岭地区。

抗日联军第六军，“九一八事变”前中共地下党汤原县委，就曾经在汤原的西北和西南农村中，组织过地下武装和徒手的农民义勇队，事变后根据省委的指示，组织反日会和人民武装——汤原游击队。1932年夏省委巡视员到汤原后，县委即积极着手新的武

裝組織，是 年 10 月 10 日組織起人數不多的一支武裝——湯原游擊隊。但是因為領導幹部缺乏經驗和在許多“反日山林隊”抱着反共的態度，這支初生的隊伍被山林隊“榮好”繳械了。同年多湯原縣委又在秋收運動，募捐購械的基礎上建立第二次——

“湯原反日游擊隊”開展了湯原、羅北通河地區的游擊活動，隊伍獲得發展壯大，但是由於黨的幹部缺乏階級警惕性及容留的土匪“老來好”暗中在隊伍拉攏落后分子，1933年6月隊內發生叛變，“老來好”等殺了黨的幹部把隊伍拉走。自此湯原縣委檢討兩次建軍失敗的經驗。派出黨團員七十多名做骨干並以縣委主要領導人為指揮員，建立第三次“湯原反日游擊隊”。

1933年—1935年初這個部隊以湯原為基地跨越松江兩岸擴大游擊戰爭，不斷獲得勝利，隊伍人數和奪自敵人手中的武器大大增加，同時得到第三軍方面的支援。1935年蔣在湯原建立人民革命軍第六軍。下屬六個團，1936年秋發展到八個團，一個青年教導隊；正式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下屬四個師，每師兩個團。

抗聯第六軍在松江左岸，黑龍江右岸，小興安嶺東和西面配合三軍行動。在松江右岸配合聯軍其他部隊行動。最初的根據地為湯原縣西北和西南六個縣區，在松江南岸為依蘭、樺川的雙牙山和太平川一帶。

抗日聯軍第七軍，中共饒河縣委在“九一八事變”開始，即在該縣朝鮮民族農民中及少數中國農民中，建立地下武裝組織形式——“農民反日自衛隊”但為當地舊東北軍“自衛軍”和救國軍破壞，1932年秋組織了六十餘人，以黨團員為骨干的“饒河反日游擊隊”公開活動，對於烏蘇里江左岸饒河、虎林等地抗日活動有好的影響，但1933年1月如該地區救國自衛軍陳東山、高玉山部隊派兵壓迫。饒河縣委指示該隊，在保持抗日的政治主張自由；共產黨組織獨立的條件下，接受救國自衛軍軍事上的統一指揮，因而被收編為一個“獨立營”。但是，“饒河反日游擊隊”因戰鬥力強，組織紀律好，在群眾中有深刻映象、事實

上保有軍事上的獨立游擊活動。1934年這個隊伍因陳東山、高玉山軍瓦解後，成為烏蘇里江左岸唯一的一支中堅隊伍，人數迅速增加，1935年1月吉東特委指示，將該部編為抗聯第四軍第二師第四團，不久該團擴展發展編成一個師（兩個團一個營）。

1936年正式改建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編制擴大，編制到三個師（每師三個團）和一個獨立團。最初的根據地為饒河縣的小佳河，响地，大菜子溝及同江縣的大旗杆。游擊活動北達同江、撫遠、西到寶清、富錦、南為虎林密山。

抗日聯軍第八軍，1934年初依蘭縣³龍山農民暴動後，編成二萬左右人的“民眾軍”。在一個月內對日寇展開了廣泛的游擊作戰，寇軍曾遭到慘重的打擊和損失。但是該軍的政治領導權和軍事指揮為地主階級分子所掌握。最初農民自發的主動地到處打擊日寇，擴大活動地區，以後地主階級的領導分子，在軍事上轉為防守的、消極的行動；同時領導成員間在戰鬥緊迫的環境中，侵吞農民暴動“果實”勾心斗角爭權奪利。甚至暗中勾結日寇特務。黨在“民眾軍”中，缺乏領導幹部，只有個別黨員參加該軍做局部工作。這樣，“民眾軍”經過三個月的作戰行動後，在日寇不斷增援軍事壓迫和使用政治分化收買之下趨于瓦解狀態。1934年秋只剩下六、七百人，由謝文東（註）率領東走企鵝渡過烏蘇里江逃往蘇聯，在饒河縣委與饒河游擊隊積極支援之下，穩定了該軍的士氣，攔阻了該軍領導人逃亡的意圖，是年末該部回抵依蘭、勃利、寧川得到我抗日聯合軍第三軍及抗日同盟軍第四軍協助并得到聯軍各部隊的支援，在方正、延壽及北牡丹江地區開展游擊活動。1935年到1936年，吉東和北滿黨加強對該軍政治和軍事領導，在軍中建立政治領導工作系統，該軍人槍大增，逐漸回復壯大，編為三個師。1936年底，正式宣布建立抗日聯軍第八軍。1937年8月增編第四師。

註：謝文東1939年4月在北牡丹江刁嶺為警衛營長姜××脅迫投降偽滿洲國後積極“反共”。1945年“八一五”東北光復後，謝在依蘭、牡丹江市之間為國民黨反動派地下軍領袖有千余

武裝，1946年春被我軍消滅。

抗日聯軍第九軍：吉林自衛軍李杜等，1933年初崩潰後，在寶清地區留有一個團。團長李華堂（註）堅持抗日，1934年到1936年間，在松江下流左岸地區得到我抗聯三軍及五軍的支持活動，黨在該部隊中加強領導，建立政治制度，1936年末，該部人數發展到四個團，編為兩個師，並正式宣布改建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九軍。

註：1939年2月進攻方正縣陳家亮子負傷，送西鳳灣里密營養傷，為日寇俘去後投降，1945年末，在依蘭方正間為國民黨反動派地下軍“司令”。1946年被我軍消滅。

抗日聯軍第十軍：1933年在拉濱鐵路沿線的滿占海、李海青、宮長海等的吉林自衛軍和其它救國義勇軍等崩潰瓦解後，在這地區殘留着上萬的“反日山林隊”報山頭“雙龍”（汪雅臣一註）就是該地區最大反日山林隊之一，人數近二千，1934年珠河中心县委曾派黨員幹部到該部隊去，進行统战工作，政治影響最好，但組織效果不多。最主要的是缺乏更多的幹部人員派到那裏去。

1935年到1936年該部人數減到千人左右。1936年末吉東黨和軍的領導組織派幹部去聯絡幫助，稍稍獲得發展，同年11月宣布取消山頭，正式建立東北抗日聯軍第十軍。重新開展了拉濱縣地區的游擊鬥爭。1938年配合第四一五軍西征部隊，活動到哈爾濱附近阿城、榆樹、雙城等地。

註：汪雅臣非黨人士，接受黨的領導，堅持抗日，1939年1月在舒蘭縣冲河山區英勇戰死，日敵對汪烈士深為含恨，將其首級割去，光復後在哈爾濱重新安葬。

抗日聯軍第十一軍：士龍山農民暴動波及很廣在輝川縣地方雙陽山煤礦開工的工人在鄭致中同志（註）倡導和率領下1934年三月，三百餘礦工舉行起義，組織“反日山林隊”推鄭致中為首領，報山頭“明山”。輝川、富錦、勃利的一些農民踊躍參加，很快就有五百餘人。一開始這個隊伍是擁護“民眾軍”的，但是成分絕大多數是工人、農民、領袖又是礦工，因此政治思想沒有受束縛